

悦读

【读典】

《长物志》:托名“身外余物”,写尽世间美好

张彩梅

晚明文震亨的《长物志》,是中国古典园林的经典之作。作者文震亨,更是被誉为懂生活、讲品味、有格调的“殿堂级大咖”。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与《长物志》有关的那些事儿。

《长物志》是一本怎样的书?

《长物志》书名中的“长”,读音为zhàng。“长物”一说,出自成语“身无长物”,意为没有多余的东西。形容生活简朴,或家境清贫。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德行》记载了一个与之相关的故事。东晋王恭随父从会稽回到都城建康(今江苏南京),同族人王忱去探望,看到王恭坐在一条六尺长的竹席上,便对他说:“你从东边来,应该有很多这种东西,能送我一条吧?”王忱走后,王恭派人把自己坐的竹席送给了他。竹席被送,王恭读书、会客时只好坐在草垫上。王忱听说后很诧异,对王恭说:“我原本以为你有很多,所以才向你要的。”王恭答道:“这是你不了解我啊,我做人一向没有多余的物品。”《世说新语》用故事赞誉王恭的简朴生活。

虽然托名“长物”,但书中所写并非“多余之物”,相反,它却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长物志》中直接有关园林的有室庐、花木、水石、禽鱼、蔬果五志,而书画、几榻、器具、位置、衣饰、舟车、香茗七志,已远远超越了园林的范围。一部《长物志》,内容涵盖园林景观设计、衣食住行、器物鉴藏等方方面面,为我们全方位展示了晚明文人的精致生活和审美趣味,是古代文人生活美学的典范之作。

生活在家族光环下的文震亨

说起文震亨,你可能不熟悉,但是说起他的家族,那可是声名远播。其曾祖文徵明,是与沈周、唐寅、仇英齐名的书画大家,被称为“明四家”之一。祖父文彭,官国子监博士,以书画、篆刻名重一时。父亲文元发,官至卫辉同知。兄文震孟,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

文震亨就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文震亨的才学、声名虽比不上其曾祖,但他在园林营造、诗书画方面的成就也是被赞誉和肯定的。明代顾苓《武英殿中书人文致仕文公行状》称赞文震亨的园林成就:



【书香书影】

“红色阅读”人气满满,“亲子阅读”刷屏朋友圈……连日来,泰州靖江靖城街道第四届“书香靖城”读书节各项活动吸引了近千人参与。

盛义 摄

【悦读悦美】

阅读的三重境界

黄裕生

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经典的民族,这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不管进入什么时代,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经典获取深度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启示,获取存在的力量与勇气。

但是,这同时也意味着我们背负着一个使命,那就是在每个时代都需要去重新理解、会通这些经典,以使每个时代的精神生活能够维持在应有的高度上,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于是,如何阅读这些经典,也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

正如对于不同美食,要有不同吃法一样,不同种类的书,也需有不同的读法。就读法而言,我们可以把书大致分为三类。

一类通常会是我们读得最多的书,就是以浏览的方式阅读的书。我们读这类书或者是为了补充一些知识,或者是为了消遣,或者是为了心灵的解放。由于这类书或者比较浅显、通俗,或者比较有趣、生动,所以,可以随时随地以比较快的速度阅读。我们在床头放的,在旅途上带的,通常就是这类书。

第二类是专业书,虽然各种专业书的内容千差万别,但都需要以专注、精准的方式阅读这类书籍,因为这类书通常都有自己的概念体系,包含着严格的概念定义与逻辑推演。这类书一般不能像前一类书那样,可以零散地阅读,而要求持续、系统地阅读,否则就无法形成一个专业所要求的系统性与整体性。

第三类书就是文化经典,包括思想经典、艺术经典与宗教经典等。这类书首先要求正襟危坐地慢读、精读。这类书成为经典,是经过长时段的历史筛选确定下来的,既不是作者本人,也不是某个读者所能决定的。而这

类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则是因为它们代表着它们所属的那个文化传统与历史进程在一个时代所能达到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它们因此甚至是一个时代之所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分界线而构成了时代之间的关节点。

因此,进入这些经典也就意味着进入不同时代而穿越着历史。我们甚至可以说,也只有真正进入这些经典,才进入了历史并生活在历史之中,或者说,历史也才作为一个历程而活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管是个人还是民族,如果没进入文化经典,也就是意味着其生活或存在不可能有历史的厚度。

然而,正因为如此,要进入这些经典并不容易。它首先要求以慢速度的方式与从容的心态去阅读。这些经典的高度或深度通常就体现在它有很自洽的学理体系,哪怕看起来只是随意的对话或编排。只有读出这种自洽的学理体系,才意味着读懂了一部经典。这就不只是需要相关的知识,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理解经典文本所讨论或面对的所有问题及其回答。

简单说,需要达到对文本的整体把握。这就要求在语句与段落、段落与章节、章节与整个文本之间不断进行反复对照、求解、互证,也即“解释学”所说的在部分与整体之间进行充分循环。所有人文经典都需要在这种充分的解释学循环中才能被深入理解与通

达。这意味着,从容慢读是进入文化经典唯一可靠的方式。

如果按理解的深度来区分阅读这类经典的层次,那么,在文本内部完成的充分循环,只是理解文化经典的第一境。进入第一境,对此经典的理解才获得一种豁然贯通的把握,而不再停留于篇言警句上,才摆脱了只知其一,不知其余的片面。在这种贯通的把握中包含着对经典涉及的那些基本问题的真正理解,而这也为理解其他经典提供了最好的基点。因此,一旦进入第一境,也就意味着上可通古,下可通今。因为古今各个时代正是由各个时代的经典来规定与标志的。

不过,也正因为由于这类经典是时代的标志,是穿越历史的各个关节点,因此,它们的意义,它们的地位,与其他经典有直接相关性。这意味着,每部文化经典的意义与地位应被置于与其他经典的关联中才能得到更好的呈现。不过,这“其他文化经典”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一种是“其他文化”经典。

阅读文化经典的第二境就是把这一经典文本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进行理解。这里所谓其他“文化经典”,也就是指同一传统、同一语言里的经典。在这些经典中,都有一部类似源头性的经典,比如中国的《易经》,犹太—基督教的希伯语《圣经》

热播剧《觉醒年代》,让我怀想民国时期的鸿儒大师们。他们学问深醇,思想在今日看来有进步,抑或有落后,今人懂得甄别,取精华而去糟粕即是。翻开案头书里的民国典籍,最显眼是厚厚两册钱穆先生《国史大纲》。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七房桥人,为一代国学宗师,“新儒家”的代表,毕生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在民国时期新旧争锋的语境下,是一位“老派”的大儒。

《国史大纲》是钱穆最重要的代表作之一。这是一部中国通史,成书于抗战时期,后经多次修订,内容涉及中国历史各时期的制度、经济、社会风气、学术思想等,字里行间饱含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温情与敬意”。这书除了功底深厚,旁人难以匹及,即便其思想的“老派”,在抗日战争国破家亡的形势下,也具有极其进步的意义,那便是唤起国人的民族自知和自信。时至今日,自然也是一位值得去读、常读新的经典之作。

如今市面通行的《国史大纲》,附有自上古至太平天国的二十八幅手绘地图。关于这些手绘地图,读者常有疑问,我便也略加探究,分享所得数点如下。

一、初版《国史大纲》没有地图,这些地图也非钱穆所绘。1939年6月,随西南联合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清华、北大、南开联合组建的临时大学)南迁至云南的钱穆,以大学通史教科书体例写就《国史大纲》,当年暑假前往香港,交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本在上海,当时因战乱已迁港,但发排仍交沪上旧厂。又交当时重庆国民政府审查,逾半年,终于1940年6月初版面世。

二、书中二十八幅地图,是直到1974年台湾出版修订版,由历史地理专家王恢所绘。《国史大纲》自沪初版起,即风行四海,自1940至1974年间,又有成都、重庆、上海、台湾、香港等多个版本,这些版本都不附有地图。

三、地图绘者王恢是新亚研究所门生。王恢(1908—2000),字子廓,号石泉,出生于广西省全州,曾入桂林中山公学,后赴港,又赴马来西亚任教华文,后入钱穆创办的新亚研究所,专治中国历史地理学。1967年起任教于中国文化大学,为一代中国历史地理学家,有《中国历史地理学》等著作。

四、二十八幅手绘地图,对《国史大纲》重要内容提纲挈领,化文字为历史空间、时间的统一。图中不仅有各种古地名的空间分布(雁门关、长安、琅琊、会稽、南诏、高句丽……),而且呈现了历史事件的动态时间线。如“春秋霸政图”,以线条、箭头和来自书中原文的说明文字,形象指示了自“春秋霸政创始于齐”至“战国秦孝公后,秦人渐次加入诸夏团体”的中国大一统酝酿过程。又如“五胡十六国图”、“太平天国图”上行军路线、迁都路线等的细致描绘,包括时间、人名的标注,更是不避繁难,令人钦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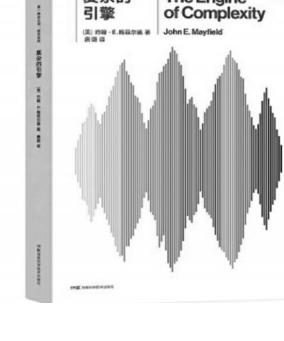
五、大多数地图都是版图,呈现的是政治力量的分布和较量,不过也有“元明会通河图”、“隋炀帝南北巡游图”这样从社会经济角度切入的地图。

六、二十八幅手绘地图的内容脱胎于《国史大纲》,不过对太平天国运动,著者、绘者史观不同。钱穆坚持把“太平天国”称为“洪杨之乱”,当初重庆国民政府审查半载,即为此事,最终初版仍是照钱穆原稿印行。书中论及太平天国运动,流露痛惜厌恶之情。而王恢所绘地图,名“太平天国图”,题头文字有“孤军直入,百折不回,转斗万里”的褒扬之语。

钱穆最欣赏的学生之一,历史学家严耕望先生在《钱穆宾四先生与我》中回忆,1937年七七事变后,钱穆在武汉大学讲学一个月。甫一开讲,就说历史学有“两只脚”,一是制度。这场开场白,对当时还是武大学生的严耕望,产生了毕生的影响,从此奠定他今后治学的两个方向。历史与地理密不可分,中华五千年历史长河,植根在广袤的华夏疆域之上。中国历史自古就有图与文结合的传统,从春秋《管子》的《地图》篇,到河南平山出土比罗马帝国地图还早六百年的古中山国《兆域图》,到西晋裴秀《禹贡地域图》开创规范化的“制图六体”,到清末杨守敬较为成熟的舆地学研究,以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出版由谭其骧先生主编的煌煌工具书《中国历史地图集》……这一传统历久弥新,反映了对神州山河的求知探索精神,其源泉则是热爱之情。

《国史大纲》诞生于民族危亡之际,本为当时北大教科书,风行全国,承载着钱穆自成年以来,即孜孜耕耘的教化之业。当其最初付梓之际,应也未曾想到,会有另一位人生轨迹迥异的炎黄子孙王恢先生,来共同完成其历史地理、文与图合而为一的因缘吧!

【悦读书架】



湖南
科技
出版社

〔美〕约翰·E·梅菲尔德 著

《复杂的引擎》结合信息、进化和计算对生物进化进行了阐释,证明了计算在进化中的核心作用,并将这套计算和进化相结合的核心机制扩展到其他领域,用来解释复杂生命、结构、组织和社会秩序的形成。这是一次正在进行的重大的科学认知范式的转换,它不仅会改变科学,也会改变人类对自身境况的认知。



出版社
〔德〕汉宁·里德 著
广东人民

为什么我们总是对远处的灾难报以极大的同情,却对身边的不幸兴趣寥寥?世界被科技手段无限缩小,也把远处的不幸拉近到每个人身边。卢梭认为人类的情感被距离拉伸时,必然会挥发、黯淡,我们之所以如此关注远处的灾难,正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担身边的义务。在《无处安放的同情》一书中,德国知名作家汉宁·里德引用了十八世纪以来的几个著名思想实验,巴尔扎克等启蒙精英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文学与思想巨擘跨越时空的思想交锋,掀起了一场关于世界大同的道德辩论。

我们是一个有文化经典的民族,这是一种幸运。因为这意味着,不管进入什么时代,我们都可以从这些经典获取深度理解自身与世界的启示,获取存在的力量与勇气。

但是,阅读文化经典还有第三境,那就是将经典置于与“其他文化”经典的对质中展开理解。很显然,这里的“其他文化”就是指另一种传统的文化。这另一种传统的文化经典构成了本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真正他者,同时也是本传统的经典能获得理解与解释的最大、最遥远的语境。

由不同文化经典开辟出来的不同传统,其根本不同不是对象的不同,也不是问题的不同,它们之间的真正不同是视角与进路的不同。这意味着,不同文化传统的碰撞,特别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相遇,是一个相互提供出不同参照系,以及寻求能把更多视角都容纳进来的更大参照系的事件。获得一个更大的参照系,是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相遇的一个必然结果,也是一个必然出路。如果说“大自然”(也许也可以称为“天”或“神”)通过产生不同文化传统来使人类从尽可能多的视角去认识、接近整全的真理,那么这也就意味着,拥有文化经典的民族文化负有一个额外的使命,那就是通过会通其他传统的文化经典来提高人类的普遍性存在、普遍性原则的水平,以便开辟新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史。

在这个意义上,阅读经典的第三境既是最难达到的,却也是今天的人们最需要努力达到的。在全球化处境下,要使世界的普遍之道肉身化为世人之道,唯有通过不同传统的文化经典的对质、会通才是可能的。

钱穆《国史大纲》《地图拾零》
吴凡